

凌叔华小说:与时代精魂异构而同质

吴政家,凌端明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中国的女性自古就受到男性话语的塑造,她们自身也认同并自觉担起了这种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霸权话语。直到五四时期,在西方女权思潮的吹拂下,女性才意识到了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凌叔华小说以其细腻、平和、不动声色的女性叙事视角,异于同时代女作家的叙事策略,为我们展现了那一时代女性如何被塑造为“女人”的事实和她们部分人的觉醒、困顿和挣扎,呈现出与五四时代精魂异构而同质的个性。

【关键词】五四;凌叔华;被塑造;男权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49-04

凌叔华,1900年生,出身仕宦家族,从小饱览高门巨族内各色女性的灰色命运,这为她后来的小说创作,垒起了最初的平台;她的自传体中篇小说《古韵》中的《母亲的婚姻》、《一件小事》等篇目,就重返了儿时的语境,重现了儿时的灰色记忆。凌氏早年师从著名画家繆素筠、王竹林,受中国文人画清幽淡雅传统的熏染,她的文学作品弥漫着一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温婉含蓄之美;作家很少在作品中中和盘托出自己的主观情感,而是以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落笔,只担当故事的讲述者,冷静书写血色的人间悲剧,但作品中随处可以听闻到作者的替身——“隐含作者”的嗟叹,使得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仿如在欣赏流淌着血丝的伤口勾画出的凄美图案,绚烂而生悲悯。她的作品不似同时期其他的女性作家作品,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狂野挣扎和深重叹息,也不似冯沅君《隔绝》中展示的女性对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及对自我人格的铮铮呼号。这情形正如鲁迅所言:“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1]异质的叙事策略,使她的作品延续了中国女性忍辱负重的文化符号,在五四女性解放的喧哗声中自顾自美丽地锁定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而韵味独特。

一、五四与凌叔华小说

在五四学人掀起自由、民主思想大潮的过程中,中国固有的人伦秩序“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等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和批判,由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焦虑,投射到文化精神层面,则是引发文化身份认同的极大困惑。在民族/国家宏大历史

叙事的场域之中,对处于边缘地带的女性重新进行文化设定与文化想象,是确立男性群体自我价值的一个首要途径。在当时的语境下,或是男性文化群体主动地寻求重构和反思中国传统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支配/被支配、中心/边缘的关系,或是先进女性文化群体抓住这个契机,率先把文学中被遗忘遗弃的女性群体推向历史前台,两者各行其道,并行不悖。由是,一批知识女性适时而动,她们或以暴涨的愤怒控诉男性社会,或以冷静思辨的方式探寻女性人生真谛,平和冲淡地书写女性苦难。但无论何种方式,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女性一向鲜为人知的伤痛撕开给世人看。先进的女性们以手中的笔来凸显女性自身的存在,试图挤入男性话语权力中心,打破传统男性逻各斯中心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正如阎纯德所言:“在‘五四’那场新文化运动中,其觉悟者不仅发现了‘人’,同时发现了‘女人’”^[2]。女性的发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女性自身的努力抒写换来的。

凌叔华是这批女性中出色的一员。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固守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为夫为子所束缚的“杨妈”式孤苦女人形象,或者是“太太”类被大家庭生活浸染,被掏空思想,只留下一副残躯苟活的女人形象;她们已然失去了作为女性的独立意识,为传统伦理所捆束,成为传统伦理祭台上的祭品。第二类是养于深闺,受时代大潮涌动影响,对爱情充满理想和憧憬,“觉得这风气也得学学”的“芳影”式的形象,或者甚至付出了行动的“绮霞”们的形象。这两类女人形象充溢于凌叔华小说文本中。凌氏以温情而不是热情的姿态与两类人物保持适当的距离,用雁过无痕的笔触,勾勒了处于社会动荡、中西思潮交汇大

收稿日期:2014-06-29

作者简介:吴政家(1961-),男,福建泉州人,副教授,学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语境中那看似平静实则风云涌动的高门一角。这些形象画出了传统女性气质被建构的心理图式,映射出女性自我意识的发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心灵的觉醒和哭泣。从“高门巨族”中这不为寻常人所熟知的“世态的一角”,可以窥视到20世纪初中国女性心路的跳荡和位移。

二、被塑造的女性

长达几千年的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社会主导,必然在文化层面导致女性话语的失落。在中国的历代文化典籍中,处处回荡着男性话语的声音;但一开始情形并非如此。如在女性作家一直倾力关注的婚恋关系上,母系时代或者说在原初社会中,男女两性呈现的是健康和谐的“睦邻”关系,“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媒氏》),整个社会也对其持宽容理解的态度,认为这是自然人性使然;即使出现背弃爱情誓言的情况,也被理解为出于某种正常的情感冲突。但是随着私有制和父权社会的逐渐稳固,男女两性之间和谐平等的氛围日渐剥落。女性在婚恋上不仅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要“壹与之醮,终身不改”(《周礼·礼记》)。婚姻对她们来说也转换为整个家族借此强化自己利益的工具和媒介。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公然宣称:“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1]23}生理的条件为“女人成为女人”提供了基础,但是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的性格、气质等精神因素的原因,则是在后来男权社会的制约和熏染下形成的,这种主流意识宰制了中国妇女几千年。凌叔华自幼身处宦宦家庭,对这样的历史文化痼疾感悟更深;她的各个姨娘的命运遭际,就是几千年女性不幸处境的鲜活缩影。糟糕和令人痛心的是,受屈辱受奴役的女性也自觉认同男性的文化霸权,欣然领受男性给她们扣上的文化枷锁。凌氏的小说展示了被塑造且无言的女性。

小说《绣枕》绣出的是一位传统大家闺秀的形象。她擅长女工,耗费了大量心思在一对绣枕上,“光是那只鸟已经用了三四十样线”,“一只绣的是荷花和翠鸟,那一只绣的是一只凤凰站在石头上”^{[1]67},可是这寄托着她对美好婚姻向往之情的情物,却被男性视为可以随意丢弃和玷污的可有可无之物:“头一天,人家送给她们老爷,就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1]61},这扎心的信息是从下人的口中无意道出的。更具讽刺效果的是,信息的披露者竟然是“小姐儿”——

一个原本她不愿意让她的手弄脏那绣枕的人!我们没有看到付出那么多心血的“大小姐”做出非常激烈或沮丧的反应,她“只能摇了摇头算答复了”。在同时期的其他女性作家中,他们毅然决然地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取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这样态度决然的女性形象与凌叔华笔下的“大小姐”忍辱不言的形象迥然不同。这种没有强力呐喊任人摆弄的女性姿态与五四时代大潮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否存在偏差?

在作品《中晚秋》中,凌叔华给我们展开的是另一幅家庭祥和的图景,但是这一幕温馨的中秋场景随着一个电话的到来应声碎落满地。敬仁干姐姐的去世,给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撒上了灰尘,他把这其中的哀伤和怨恨都扣在了他新婚妻子的身上,不曾吃完中秋饭便匆匆离去。这个偶然的事件在太太的心中种下了不详的预兆:“没有吃团圆鸭,团圆宴还是不团圆,她恐怕这是他们来日的征兆”^{[1]36},随后一只花瓶的破碎,更加重了她的猜忌,把后来家庭发生的一系列不幸的遭遇归咎于“命”。她在家庭中谨小慎微地存在着,把丈夫看做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当她视为自己存在全部意义的家庭最终破裂的时候,她依然没有觉醒究竟是什么让她落到这样的境地。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太太”们被男性主导的男性本位文化所俘获,这类女性打心底里认同自己应该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她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丈夫打理产业度日,她们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后勤”,丧失了或者说主动放弃了家庭中的话语权和独立的可能性。

凌叔华小说中女性忍辱顺从的性格,是否与五四精魂存在趋势性的偏差?答案是否定的。在凌氏小说里,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文本中悲悯气场的冲击,只是作者没有任何表明立场或观点的言语,而是以故事本身抗议着;对男权世界的霸道,她们没有一点点反抗,而是像奴隶一样地忍受着;对生活 and 未来没有明确的企盼,缺乏撕裂封建婚姻、走出闺门的勇气——但这样更让人倍感其悲哀和不幸,从而达到了刺痛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目的。更妙的是,这种深入灵魂世界、非金鼓齐鸣式的剖析,契合长久以来大多数人对女性美的认知模式,以女子的柔弱来诉说其屈辱,可以起到“金刚怒目”式反抗或呐喊所达不到的作用。何况在五四“自由、平等”的文化大潮下,绝大多数人都在为解放他人和解放自我而奔走呼告,当凌叔华的小说

以一种低沉和“不觉醒”的姿态呈现,自然会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因为艺术的生命就在于独特和创新。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凌叔华一登上文坛,就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惊叹,这固然与其文采斐然有关,但恐怕也和她这种“雁过无声”的叙事策略有关。最后,她对女性的书写是与几千年来男性话语对女性心理奴役的怜悯揉搓拍合的,当历史的不理智声音和情绪随五四大潮渐次退去的时候,这样的书写或许更能凸显其小说人性的、文化的魅力。

三、挣扎与觉醒

五四思潮随之席卷的女权运动,逐渐蔓延在古老中国大地上。凌叔华一方面尽力不动声色去抒写那些仍然“不觉醒”乃至麻木的灵魂,一方面也触及了那些勇于发现自我灵魂与价值、显露现代女性冰山一角的新女性。这些女性在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的感召下,懵懂地意识到“这风气也得学学”,开始关注自己的意识、经验、主观体验与男性不一样的地方,甚至踏上了寻求思想独立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不归路。但是时代抛给了她们机会的金枝,却未必为她们铺好了找回丢失灵魂的大道。凌叔华以内倾式姿态站在女性视角,以平淡琐碎的生活为切入点,写出了女性在发现自我与实现自我的过程中遭遇传统男权社会阻力甚至凌辱的惨状,揭示了女性在这样一个男性“重重围剿”的社会语境下,实现自我解放和自我价值的艰难。

其小说《绮霞》讲述了一个有着音乐才华的女主人“绮霞”自从有了家庭之后,为家庭诸多繁杂的琐事所牵绊,早已把曾经的音乐梦想束之高阁:“墨漆皮的套子已经铺满了灰黄的尘土,旁边挂了一个大蜘蛛网子,近琴套子的地方隐约露着许多有尾巴虫子爬过所遗留下的闪光痕迹”^[109],她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家庭的维护中,安安分分做起了贤妻良母的角色,逐渐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个性,成为其夫家的奴隶,整个人“像冥衣铺糊扎的纸人似的,有些森人”^[110]。但当她偶然遇见曾经的精神导师并被诚恳地批评以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性灵的堕落,精神导师的一番话语重新点燃了她心中本有的女性意识。她开始了自赎的行动,拾起了旧日尘封的琴,“日出时霞彩漫天,她便想谱一章《钧天乐》歌颂这富丽伟大。日影满窗时……便想谱一章《思亲》”^[111],这样的日子表面上与家庭的和谐不发生冲突,表层下却涌动着矛盾的岩浆。老太太开始埋怨:“她这些日子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黑白都抱着一

个琴玩。”在老太太的眼中,这是不务正业的,她无法明白这是灵魂救赎的一种途径,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绮霞也陷入了踟蹰,忙于在家庭和爱好之间寻找平衡支点,结果总是不得其所。一个意大利小提琴音乐家的到来,终于驱除了她的心理阴霾。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丈夫卓群留信告别,去追寻她心中的音乐天空,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保持了灵魂的英挺!当然,她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等待她的是被丈夫遗弃的宿命,社会身份拽住了,家庭角色却丢失了!

凌叔华在这里比其他女性作家技高一筹,指出了女性觉醒的更高境界不仅在于实现爱情的自由、平等,更重要的是敢于在婚姻后实现灵魂的独立和自由,这是茫茫暗夜里航标灯般的启示。与其他作家作品的人物形象不同,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鲁迅《伤逝》中的子君,这些人物显得铿锵有力,自我张扬,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但是凌叔华的绮霞温文尔雅中散发出来的新女性气质更让人无法抗拒,有让人深思玩味的绵绵魅力。

四、结语

历史的沉珂在女性身体上、心理上刻下了太多太深的痕迹,到了五四这一切发生了可喜的嬗变——被动或主动的、喧嚣或沉静的改变。凌叔华沐浴着五四的清新之风,享受着新女性初夏般清朗的甜美,平和却动情地挥动她的隽秀之笔,刻画出了两大类女性形象,既陈列了被塑造成“女人”的形象,也铺排了彷徨迷惘中挣扎的女性形象,给新女性划出了一条清新亮丽的道路,就是像绮霞一样去发现自我、走出家庭。在这两类形象中,凌氏运用独特的叙事策略,即不同于五四时期风行的扬厉、激情的风格,而是把狂热的呐喊化为凄美的抒情、文化的批判。她们有愚昧,但又是可怜的;她们在觉醒中,但内心又无时无刻不在动摇。凌氏在娓娓道来讲述那些被束缚、寻求出路的女性时,貌似不含感情,实则用情至深,使得这些女性更顺应了五四对“人”的发现、对“女人”的发现,而不再是一个与男性对立的存在符号。姑且不论在依然是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女性不允许独立地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即使允许,她们也没有可供倚靠的经济基础,无法真正像绮霞那样找回自我。但这是时代的清风,沁人心脾,直抵心灵深处。鲁迅曾言:“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们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可看见辉煌的曙色的。这一时期,有勇气走出去的女性,要么堕落了,要么死掉了,要么走回

来。”^①“绮霞”们的出现,无疑是一抹曙色。凌叔华塑造的这两类女性形象在五四这个广阔天空下,以人性为底色,配上或忧或喜的蓝色黄色乃至曙色,从而获得了其恒久的魅力。她的作品,对于我们今

天商品经济、消费文化大潮中的女性,如何在社会生活中不被支配被奴役,发现并积极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经济和灵魂上的独立,是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 [2]阎纯德.试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J].中国文化研究.2002(8):135.
- [3]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 [4]凌叔华.中国现代文学百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 [5]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Ling Shu-hua's Novels: Different Structure but Same Spirit Compared with the Soul of Era

WU ZHeng-jia, LING Duan-ming

(Quanzhou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The Chinese woman are modeled by power of men continues a long time, and they agree with these attitudes and bear the hegemonic discourse voluntarily. Female realized the subjectivity and unique in themselves under the blowing of western feminism until the period of May-4th. Ling SHu-hua's novels with its perspective of female narrative different from others writers in the period of May-4th. Her novels displayed the fact of modeled women whose awaken and struggled. Its writing personality seems present different structure but contains the same nature just as the spirit of May-4th.

Key words: May fourth; Ling Shu-hua; modeled; the power of male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 39 页)

Comparative Study about Yan Mengqing and Lin Daiyu

MO Luo-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Yan Mengqing and Lin Daiyu are two typical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They are perfect im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dy which represents the author's ideal. It suggests that the living beings are metaphor for human and those noble character of them reflects the purity of human nature, which suggest the two women's destiny. By combining emotion and traditional ideas, the author also shows his appreciation on human nature. When it comes a sad ending that is about a premature death of the ladies, instead of giving a normal happy ending, it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author's new understandings towards life attitude. Besides, those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appear that the author is positive about the good impact on kindness and caring.

Key words: Yan Mengqing; Lin Daiyu; living beings; emotion and traditional; death

(责任编辑:周锦鹤)